

# “蒲案”的巨大影响和历史的启示

原荫盛

“蒲案”不是一次普通的学生运动，而是中国革命一次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开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陕西人民，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就为防止和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悲惨命运而英勇斗争。鸦片战争时期，陕籍爱国名相王鼎为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反对割让香港给英国，反对重用卖国贼穆彰阿，流放民族英雄林则徐，向道光皇帝“尸谏”；“百日维新”也有陕籍举子。但均遭失败。“蒲城学案”则不同，它不是一轰而起一轰而散的乌合之众，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一时冲动，而是由近代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领导的一次比较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北洋军阀窃夺。孙中山领导了“护国”、“护法”运动。“蒲案”以后迅速成长起来的陕西人民革命力量，迅速掀起了“讨袁（世凯）逐陆（建章）”和反段（祺瑞）讨陈（树藩）”运动，并且成立了陕西靖国军。在八百里秦川与北洋军阀周旋四年又五个月之久。后来，胡景翼（笠僧）、曹世英（俊夫）虽接受了直系军阀的改

编，陕西靖国军被瓦解。但不久以后，胡景翼又与冯玉祥、孙岳联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线举行了“北京政变”。成立了人数更多、控制地区更广的国民军，继续反对北洋军阀。尤为突出的是，以坚持“革命的旗帜下不能倒”，表示要保持革命人格的陕西靖国军的中流砥柱杨虎城将军，也立即与井岳秀将军一起，成立了陕北国民军。并于1925年率所部及井岳秀的部分军队，挥师南下关中，举行了驱吴（新田）运动。驱逐了北洋军阀在陕西的爪牙，使陕西永远摆脱了北洋军阀的控制。这是杨虎城将军对陕西和西北革命的重大贡献之一。

北伐战争前夕，北洋军阀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广东革命政府，妄图首先扫清北方的国民军。冯玉祥被挤出北京，退守南口、张家口等地，河南的国民二军因胡景翼病故，领导力量削弱，二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灭。吴佩孚妄图消灭陕西的革命力量，恢复其对西北的反动统治。命令刘镇华以原镇嵩军为基础，纠集兵痞、流氓、土匪号称十万之众，以“到陕西去升官发财”相号召，蜂拥而来，兵逼西安城下。西安驻军首领李虎臣新从河南败退归来。手下只有国民二军留守机关人员加上卫兵一的人马还不到五千。既无杀敌之勇，又无御敌之策。人们便把目光集中在杨虎城将军身上。杨将军不负众望，亲率精锐五千，从三原驻地挺进西安。团结军民，坚守西安孤城8个月之久。最后在冯玉祥、于右任率部救援时内外夹攻，不仅西安围解，而且在陕东各县农民奋起围剿下，彻底消灭了号称十万之众的“镇嵩军”。杨虎城坚守西

安，彻底粉碎了吴佩孚消灭陕西的革命力量，恢复北洋军阀在西北的反动统治的迷梦，捍卫了西北革命阵地。由于坚守西安之役，开始于北伐军誓师北伐之前，结束于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在战略上有力地声援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实际上也是北伐时期革命力量在北方的战略支撑点，是另一个战场，是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在“蒲案”的激励下献身革命的杨虎城将军，虽然只上过两年私塾，但在尖锐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不仅业已锻炼成为一位多次与十数倍于己的敌人拼搏且终获胜利的军事将领。而且成为一位善于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战胜主要敌人的革命的政治家。他在陕西靖国军失败，蛰处陕西期间结识了共产党人魏野畴，即与孙中山分别在南方和北方呼应同步走上联共救国的光明大道。成为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和联共救国方针的坚决拥护者和捍卫者。“驱吴运动”和坚守西安等都是联共救国的光辉范例。因此，从中国共产党陕西组织成立时起，便和以杨虎城将军为代表的陕西民主革命力量相结合，成为革命的手足兄弟。这是陕西革命力量长期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

1927年，北伐胜利途中，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杨在顶头上司冯玉祥促成了蒋、汪合流，白色恐怖席卷全国时，杨虎城将军在皖北大和驻地大义凛然地公开坚持国共合作，收留并重用在别处无法立足的共产党人。共产党、共青团等革命组织在那儿公开存在，公开活动。杨虎城

将军曾表示自己要做“第二个贺龙”。并且正式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杨虎城将军这些举动，当时在全国各地军队中是绝无仅有的。由于中国共产党左倾关门主义严重，杨的入党志愿一时未能实现。后因部队的饷械无着，不得不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寻找生路。但杨虎城坚持联共救国和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的革命立场从未动摇。他利用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矛盾日益加剧的形势，在驻防河南期间，杨曾率部“雪夜奔袭驻马店”，给了武汉派唐生智集团以致命性的打击。又进军陕西，摧毁并夺回了冯玉祥窃据的西北基地。回陕以后，又继续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推行了“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指杨与陕北红军）团结，反蒋救国”的 24 字方针（1933 年后调整为“联共反蒋救国”的 6 字方针）。陕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一个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主要依靠上有长期光荣革命传统的根据地军民的艰苦奋斗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但陕西有杨虎城将军这样一位顽强的坚持三大政策的“封疆大吏”，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外部条件。尤其重要的是 1936 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杨虎城将军和张学良将军联手在反共内战前线举行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制止了长达十年的反共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抗战的实现。挽救了中华民族，挽救了中国革命。

经过八年抗战，中华民族在中国百年来的对外战争中第一次获得全胜的结局。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四

强之一。蒋介石也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并称为“四大领袖”。毛泽东称杨虎城为民族英雄，周恩来称杨虎城和张学良将军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然而，蒋介石却背信弃义恩将仇报。囚禁张学良达半个世纪。杨虎城将军在被囚 12 年后于新中国成立前夕被蒋介石暗杀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在张、杨被囚后，杨将军的思想事业并未中断，他自己虽然失去自由，但杨将军的十七路军在八年抗战中，仍继续坚持他的联共救国方针从未动摇。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妄图迫使他们参加反共内战，他们乃先后举行反内战起义，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毛泽东同志指出：“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是军队统战工作的典范。”同时，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十七路军的光辉历程，乃是孙中山三大政策和杨虎城联共救国方针的伟大胜利。也是“蒲案”开始的陕西革命党人革命历史的光辉体现。

回顾这段历史，主要有下列启示：

第一、“蒲案”是辛亥革命前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运动。波及陕西全省，震动全国，在国外也有影响。涉及者不只是血气方刚的年轻学子，还有德高望重的举人秀才。支持他们的更有地位很高的名流学者。他们的英勇斗争不仅为学界敬仰，而且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不仅劳苦大众积极响应，甚至一些开明的陕籍京官也联名上书朝庭，参奏酷吏劣绅“毁学仇路，毒害士类”的滔天罪行（按李体仁仇视修筑西潼铁路，胡说什么：“铁蛇进潼关，陕西祸连天”）。“蒲案”的影响不只在当时，对以后的革命也有长期的

深远影响。1938年蒲城抗战先锋队总部在一份传单中写道：“自蒲案结束以后……五四时代，青年参加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参加的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直到七·七事件发生之后，一般青年仍然继承着老前辈的奋斗精神，努力参加神圣的抗日工作”。因而“蒲案”可谓近百年陕西青年运动的开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的先声。

第二、同盟会领导人井勿幕等适时果断地决定联合“哥老会”等反清力量，和他们一起“开山堂”，甚至连他们的联络方式、联络暗语都予以学习利用。这对扩大革命队伍，加速武装起义的准备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陕西革命力量的迅猛和持续发展，直至产生陕西靖国军这样庞大的武装革命集团，与这一正确决策都有密切联系。

第三、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强大众多的。要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没有新的革命力量和新的革命理论是不行的。陕西靖国军的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杨虎城将军蛰处陕西期间结识了陕西共产党人魏野畴，走上了联共救国的道路，精神面貌工作面貌都发生了质的飞跃。“驱吴运动”和坚守西安的光辉胜利都说明了这一点。

第四、英雄人物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红、白两种政权严重对立的局面。杨虎城将军“做第二个贺龙”的愿望一时无法实现。不得不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区寻找出路。而又不愿改变他的政治立场。于是就扮演了一个

在实践上继续三大政策的国民党的封疆太吏。在国民党新军阀的反革命政权下创造了一个坚持孙中山革命的新三民主义的局部政权。“西安事变”乃是国民党内两条路线的公开冲突和公开较量。十年内战的被制止，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抗战的实现，乃杨虎城将军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杨虎城、张学良将军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是孙中山先生忠实信徒和三大政策的坚强卫士。

杨虎城将军的革命历史从“蒲案”起点。他是“蒲案”以来陕西人民乃至西北人民革命的杰出代表之一。我们应该从他和其他革命先辈身上认真学习，吸取营养，努力自爱，刻苦磨炼，把自己锻炼成对祖国和人民有益的人。杨虎城将军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尊敬和赞扬，为人民大众深切怀念，是由于他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奉献给祖国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是由于他为了救国救民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是由于他追求真理，是因为他为祖国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使我们的祖国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无逊色。让英勇献身的先烈能够瞑目。让我们的后代能感到自豪。

（本文作者是原陕西师大副教授，蒲案中烈士原斯健之侄）